



汉朝留给我们什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长乐，欢宴未央，这些都只是梦想，我们在汉代历史中找到了《古诗十九首》，找到了求仙问道的汉武帝，找到了马王堆汉墓中那幅描绘天地三界的帛画。这其中的情感和期冀，古今一致。如王子今先生所说，汉人的情感丰富，而情感史正能体现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特征。



《秦汉文化风景》
作者：王子今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版
定价：35.00元

□书评人 子班

“汉朝留给我们什么？”王子今先生的新著，开篇便说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它的答案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中一些久远、独特且本质的东西。

“闲放”的汉代

若是追溯历史，上下五千年，秦汉之际只能算历史的中途。我们为今天的种种文化现象寻找根源，又多喜欢尽量上溯远古，直攀三代，难得在中途歇脚观赏。其实，若是论在后世的影响，秦汉并不逊于其前代。譬如，古人说到理想的政体，难免要追想上古三代，但实际上，汉代才是第一个统一、繁荣且国祚长久的封建王朝，其政治制度在后世传承甚广，远非其他朝代可比。

又如，说到古代思想，自然不能不提儒、道、释三家。儒、道产生于先秦时期，只是诸子学中较为显赫者，儒家到了汉代才被立为官学，从此成为思想正统，道家也是在此时经过一番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种宗教的形态。至于佛教，本出自印度，却也是

在东汉时才传播到了中国。甚至历史著述本身，也不能不以汉代为典范。今人提到古代的史学传统，总要从孔子的《春秋》说起，但后世连绵不断的“正史”，遵循的却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开创、完善的编撰体例。

借用汉魏学者的话讲，人们论说历史，总会有一种崇尚贱今的倾向。即便是汉代人，也经常憧憬上古政治之美好、文化之昌明。但若仔细辨析便不难发现，今人的文化基因中，汉代留下的印记正自不少。

文化毕竟是个大问题，此处只能略说一端。譬如，汉代国力昌盛，文化上有一种阔大、进取的面貌。本书作者引用鲁迅先生的话，称之为“闲放”，很是恰切。不过，“闲放”并不意味着剑拔弩张、鲁莽直接，更不是成熟老辣、略无顾忌。相反，汉代人，说到古代思想，自然有一种天真、质朴的特点。如同青年人，面对敞开的世界，忍不住去施展手脚，自由中也有掩不住的生涩和疑虑。因此，汉代历史中多有分歧、争论，似乎汉人也拿不准应该怎样评议自己的时代。举一个例子，汉代开疆拓壤的功业显

赫，汉代君臣在用兵四裔、经略西域时的作为，绝对称得上“闲放”二字。但对于这样显著的成就，当时也不是没有争议。汉武帝用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战功卓越，司马迁作《史记》，却把同情更多地给予了封侯不成的李广。到了汉宣帝朝，儒臣夏侯胜更是直接批评汉武帝，称其战功抵不过在民生方面的失德。汉元帝时，陈汤、甘延寿诛灭郅支单于，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至今凛然。但二人功成封侯，却遭到了朝廷大臣的反对。显然，不管是在汉代还是后世，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应该以征伐为能事。

优美婉丽的汉代

不过，尽管有争议，汉代的恢廓格局还是不可阻遏的扩张起来，争议也为这格局填充了更丰富的内容。东汉班固写过一篇《两都赋》，看起来就像是对这一情形的隐喻。东汉定都洛阳，很多人认为洛阳格局狭窄，建议迁回西都长安。这场争吵很快演变成为对汉家政治、文化品格的讨论。在《两都赋》中，“西都宾”描述了长安壮

观的宫城园囿和皇家狩猎活动，暗示这样铺张奢侈的景观才能与汉家立国开疆的功绩相匹配；“东都主人”则讲述了东汉君主节制勤俭的行为，指出这些才符合儒家的德政。文章最后，“东都主人”折服了“西都宾”。有趣的是，尽管节俭胜过了奢侈，这些内容却都是以汉代大赋的形式写出来的。这是一种以铺陈侈丽为美的文体，在当时流行，恰恰可以看作是汉代“闲放”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一种体现。大而言之，东都、西都两者的不同文化精神，构成了一种持久的张力，在汉代，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时候，都在推动着社会、政治的演进。

当然，只有“闲放”两字，是远不能概括汉代文化的全貌的。“闲放”并不等同于粗豪。汉代文化中也有另一种优美婉丽的风貌。我经常感慨西都长安官殿名称之美，“长乐”、“未央”、“昭阳”、“增城”，历经千年，更加神清骨秀，风韵流转。相比之下，唐代的“太极”、“大明”便显得直露，明清两朝的就愈加尘下了。大概正是新兴王朝那种自信而敏锐的感觉，使得汉人在这两字之间也能融入

美好的情思。再仔细体会，还可以发觉，“长乐”、“未央”的名称中，蕴含了一些哀伤的味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人生长乐，欢宴未央，这些都只是梦想。因此，要及时行乐，要祈求长生，也因此，我们在汉代历史中找到了《古诗十九首》，找到了求仙问道的汉武帝，找到了马王堆汉墓中那幅描绘天地三界的帛画。这其中的情感和期冀，自然也是古今一致的。如王子今先生所说，汉人的情感丰富，而情感史正能体现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特征。

王子今先生的这部新著，从多个方面介绍了秦汉文化，其中有宏观的通览，也有细致的疏解。既论述了民族精神、“儒教”发生等“大问题”，也讲到了汉代官吏、学者、商人、士兵生活的方方面面，还经常从文字入手，通过对词义演变的梳理，揭示重要的文化现象。虽不是结构森然的作品，但这许多短篇文章，读来既生动有趣，又增益见识。一卷读罢，庶几可以回答作者自己提出那个问题：“汉朝留给我们什么？”



汉代壁画“仙人六博”。“仙人六博”是汉代最为流行的赌博游戏。



有“人”的学术史

□书评人 游伟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治学的人，自然首先要弄清“物理”，明辨是非。然而止于“物理”，在学问中看不到“人”的踪迹，这样的学者与一部百科全书或者一台电脑何异？从这个层面上讲，学术的薪火相传就远远不止知识的言传，一代代学人在前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独立人格与人文心灵才是学术史的灵魂。最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涉及前辈学

者的回忆性书籍与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大概也正是春风化雨的温情所致。最近出版的张春田、张耀宗主编的《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则是将这些个人性的文字拢聚起来，通过29位著名学者教授回忆师长的单篇文章，向读者展示更加宏观更加生动的学术传承史。

诚如陆谷孙先生在回忆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必女士时所说，“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绵延不绝，相嬗于无穷的。”这些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在具体提

到知识启发的同时，说得最多的，还是师辈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方法指导，以及在更加私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的人格魅力。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巫鸿在回忆张光直时，讲到自己的报告与论文虽然十之七八都由张先生亲自辅导之后，还特意补充道：“但他对我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这些具体的指导……我自以为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学问、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巫鸿坦诚地讲到，像他那一辈的

读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学术的根底并不扎实，即便是因为一篇论文而有幸获得张先生的青睐，得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指导，以往治学中的断裂和漏洞则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获补足。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的作者有些并不是自己所回忆师辈的及门弟子，比如罗志田就并未在张芝联门下受教，许纪霖也只是与王元化有过比较多的私人接触，然而由于精神气质的相似，他们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与心照，同

样构成了学术史传统塑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位编者能如此开放地编选文章，大概与他们的初衷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文心灵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编选一本回忆文集，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仅仅只是怀旧，而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这样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学术史”即便不能完全承担起此等的重任，但愿它至少能是一种慰藉。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张春田 张耀宗 编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定价：39.00元